

禪與禪比較與對話

◎莊國彬（學術出版組組長）

——年一度由本校主辦的「佛——教禪修傳統國際研討會」系列，續以「比較與對話」為第二階段主題，2014年10月25、26日於國際會議廳舉行，邀集臺、印、中、日、英、比、德、義等一百多位學者與會，共發表十四篇論文，持續探討佛教禪修傳統的理論與實踐。

研討會邀請義大利籍維拉底教授（Prof. Giovanni Verardi）發表專題演講「凝視圖像：從政治觀點看禪坐、成道、弘法」（Before the Image: Meditation, Awakening, Teaching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最後在校長惠敏法師主持的座談之後結束。

本次研討會仍著重不同禪修傳統的交流與探討，並從佛教禪修傳統的自身比較，以及與其他宗教、跨學科的對話，促進各界對佛教禪修與禪修研究方法的了解；多篇論文與實踐應用結合，為此次研討會的特色，每篇論文不設特定回應人，讓所有與會者有更充分的互動時間，在思辨與



▲「佛教禪修傳統國際研討會」共發表十四篇論文，在思辨與討論中激盪出智慧的火花。

討論中激盪出智慧的火花。

佛教學系學士班主任果暉法師認為，十多篇論文涵蓋早期佛教、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多篇論文更將禪修與實際生活銜接，討論西方社會關注的禪修主題，參與者可透過研究者的視角，有助啟發佛教研究與當代社會弘化的新思維。

MBSR創始人

卡巴金博士來訪

◎溫宗堃（語言與翻譯中心主任）

正念減壓課程（MBSR）的創始人喬·卡巴金博士（Dr. Jon Kabat-Zinn），應邀於2014年11月6日訪問本校，參訪了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禪堂、與校長惠敏法師、德國無著法師等進行會談，並為學院教職員學生帶領三小時正念工作坊。

首度到臺灣的卡巴金，二十六歲接觸佛教禪修，1979年在麻省大學醫學中心開辦減壓門診，成立「正念醫療中心」，透過種子師資的推動，正念課程逐漸進入醫院、學校、企業、監獄等。卡巴金博士表示，影響他最深的佛教禪修傳統是禪宗。他也曾閱讀過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的著作，如今實地參觀法鼓山的建築與環境，對聖嚴師父更感敬佩。

在工作坊中，卡巴金博士介紹正念減壓課程和它激起的回響，並帶領簡短的正念練習。他說明正念減壓創立的初衷，是為了在苦難的磁石——醫院，以一種普世的、常識性的語言來教導「法」，藉以幫助那些傳統醫療已無法為他們提供更多協助的病人。在他的心中，正念減壓從最初就是一種善巧方便，希望讓眾多不會到寺院、禪修中心學習法

的人，有機會接觸法，學習運用內在的資源，減除身心之苦，走上探索自我和解脫的道路。

卡巴金博士也提到，1990年代他向達賴喇嘛和其他科學家介紹正念減壓時，有位宗教學者當面反對，認為他擷取佛法的片段，以代替完整的佛法，而這樣的作法會毀壞佛法。但達賴喇嘛卻說，在所有的人口之中，佛教徒只是其中一部分，當所有人都在受苦時，我們能把法只留給佛教徒嗎？

卡巴金博士這次的到訪，讓學院師生更清楚了解，正念減壓是一種運用禪法利益社會的善巧方便，讓更多人尤其是非佛教徒獲得佛法的利益。



▲正念減壓課程創始人卡巴金博士，應邀訪問本校，並帶領正念工作坊。

佛教藝術考古學權威

維拉底教授 分享畢生研究精華

◎鍾澤豐（圖書組代理組長）

2014年10月9至20日期間，義大利籍維拉底教授（Prof. Giovanni Verardi）受邀訪問本校，進行一系列演說，主題包括從印度佛教藝術考古學觀點，主講「阿育王的以『法』治國」、「佛教於古印度之吉凶禍福」、「玄奘所見之印度佛教」等，與全校師生分享畢生研究精華。

本校圖書資訊館在法樂法師（Sāmaṇeri Dhammadinnā）的協助下，取得了維拉底教授完整的私人藏書。維拉底教授退休前任教於拿波里東方大學（University of Naples "L'Orientale"）印度與中亞考古學系，2007年退休後，致力考古研究。他曾經是 ISIAO（Italian Institute for Africa and the Orient）組織的會員，先後擔任阿富汗、尼泊爾和洛陽龍門石窟等考古團



▲維拉底教授於「佛教禪修傳統國際研討會」中，發表專題演講。

主持人，並受邀評估與修復遭受戰火破壞的巴米揚大佛。

因此，他的私人蒐藏包含了許多此領域的珍貴與絕版藏書。包涵教授早期著作、印度考古學、圖像學、中國及日本佛教藝術等，多是珍貴的絕版藏書。校長惠敏法師和圖書館館長洪振洲都表示，這批藏書使得圖書館佛教藝術資源更為豐富。

校長Tea Time
惠敏法師

佛教的變異之因應： 身心健康、終身學習→心靈環保

2014年8月19日，敝人參加了維也納大學主辦的第十七屆IABS（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國際佛學研究協會）研討會，參與「四無量心之禪定與解脫的傳統思想與當代的發展」（Meditative and Soteriological Developments of the 'immeasurables' (apramāṇa) from Early Buddhist Thought to their Contemporary Receptions）論文發表場次。8月20日，敝人離開維也納，飛往馬來西亞吉隆坡，於21日晚間，在鶴鳴禪寺演講「心的祕密：慈悲禪修之宏觀與微觀」

的議題；23～24日，受邀為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所主辦的2014年「佛教當代關懷研討會」，以〈佛教當代關懷：佛教的變異問題與因應〉為題，做主題演講。

演講中，我提到佛教的變異問題有許多的面向，若要全面性地防範佛教的各種變異問題，既是佛教當代關懷的目的，也是一項長期、艱難的工作。一方面，各地佛教界需要經常互相切磋，交流合作，維持具備正見、清淨、精進與四眾弟子和合的佛教教團，共同發揮安定人心與淨化社會的功用。另一方面，從每個人的生

活教育開始，加強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長期深耕播撒正見、正信的種子，生根發芽，形成穩固的「心靈環保」基礎。

例如，有關每個人的生活教育，或許可以敝人近年來所提倡的「身心健康五戒：微笑、刷牙、運動、吃對、睡好」，以及「終身學習五戒：閱讀、記錄、參究、發表、實行」作為參考指標。藉由這兩大類的習慣養成，形成穩固的「心靈環保」教育，我們比較不容易因為身心健康的問題，以及知識無法與時俱進，因而，當發生天災人禍等災難或個人與家

庭變故而成為自他身心的無助、無知等脆弱因素，導致無法分辨「倫理、生理、心理、物理」等不同層次的「善惡、苦樂、憂喜、利害」因果法則，讓負面的「怪力亂神」有機可乘。

外在社會環境的污染與混亂，根源於內在心靈的染污與混亂，

我們應從「心」做起，發揮波形圓周式擴展模式，從個人生命的淨化，擴展到社區、社會、環境的淨化，這也是法鼓文理學院發展的方向。例如：加強生命教育，自我觀照與價值反思，建立正確的生命倫理觀；促進社區社群再造，涵養對文化傳承與社區的使命感與多元價值；提倡社會企業與創新，重視公益價值及其實現，重視助人、互助、互惠與合作之價值；從生活到參與環境傳播與教育之態度與生活習慣養成，實踐環境倫理，探索與反思人類「環境與發展」永續的願景，全面性地提昇人的品質，促進人間淨土的建設。



北傳佛教面面觀

韓國曹溪宗的僧伽教育

◎釋鍊玉（韓國籍，佛教學系學士班二年級）

「大韓佛教曹溪宗」是韓國最大的佛教宗派。基本修行的法門是參話頭的看話禪，繼承臨濟宗的禪法。西元九世紀有一位道義國師，他是西堂地藏的弟子（馬祖道一宗門），從中國（唐朝）回國之後，開始弘傳禪法，成為韓國禪宗的開始。高麗朝末期佛日普照國師牧牛子智訥（1158～1210），受圭峰宗密的影響，後來主張「定慧雙修」、「禪教兼修」的思想，他在松廣山吉祥寺修看話禪，看《大慧語錄》之後忽然開悟。道義國師是曹溪宗的創辦人，普照國師是曹溪宗的中祖，後來松廣山吉祥寺改名為曹溪山松廣寺。

根據以上的歷史，開始了曹溪宗僧伽的教育。曹溪宗有兩個基

本教育機關，分別為講院（僧伽大學）、基礎禪院。講院的課程是禪坐的理論與學習，以及在僧團生活的清規，以適應出家法師的行為、威儀為主；基礎禪院的課程則以修禪為主。

講院上課的科目大部分都是跟禪修（看話禪）有關。《緇門》是緇門班（一年級）上課的課本，四集班（二年級）的課本是大慧宗杲的《書狀》、高峰原妙的《禪要》、圭峰宗密的《禪源諸詮集都序》、普照智訥的《法集別行錄節要並入私記》，四教班（三年級）的課本是《圓覺經》、《楞嚴經》、《金剛經》、《大乘起信論》，大教班（四年級）的課本是《華嚴經》。除了這些科目，還有「中

觀」、「唯識」、「佛教史」等的科目。

基礎禪院一年級每天打坐六個小時，另外時間則是出坡，例如在大寮煮飯等；三、四年級跟比丘法師們一起，每天打坐十個小時，也要上禪修理論課。這樣四年畢業之後才能受具足戒。東國大學佛學系、中央僧伽大學也算基本僧伽教育單位。

受戒之後，要到任何地方修行都可以，可是每個夏、冬安居都要回來，在國外讀書的法師，或者在其他國家道場修行的法師，須寄給宗團在學證明、在外國道場的證明書，那也算是結安居。曹溪宗的宗團承認世界上所有的佛教道場都是修行的道場，而且所有的法師都是佛弟子。

越南佛教現況

◎釋德光（越南籍，佛教學系學士班三年級）

越南佛教最興盛的時期是在西元十到十四世紀，曾為越南的國教。雖然後來有其他宗教傳入，但佛教仍然是最大宗教。依據越南佛教會的統計，現在越南已皈依的佛教徒有將近四千五百萬人，有四萬四千多位僧人、一萬四千七百多所寺院。

除了北傳和南傳佛教，越南還有1944年以來結合南、北傳佛教而成立的乞士佛教。其中北傳佛教普遍分布於越南各地；而南傳主要發展於西南與東南部；乞士佛教分布在南、中部。乞士佛教在實修與教理方面，忠於原始佛教，然而也接受大乘菩薩道精神而提倡素食。

越南民族包容性的特色，影響了佛教，各個不同的傳統因此相依互補地一起發展。不同道場、不同傳統互相交流沒有排斥心態，形成多元且具包容力的特色，這點也是我引以為榮的地方。例如中部佛教的梵唄，有宮廷雅樂的味道；西南地區的梵唄，又融合了當地著名的歌彩戲腔調；而北部的梵唄卻受到傳統音樂的影響。

越南北部的僧人人數最少，卻因一里一寺的民間觀念，而有繁多的寺廟，不過多半是小規模，

同時也受到民間信仰的影響，寺院裡也供奉了一般民間信仰的神。中部和南部大多數是叢林規模，中部的叢林生活型態清規嚴謹，南部則是最能代表越南佛教多元特質的地方，也是越南佛教最興盛的區域。在那兒，可以看到同一條路上有淨土、禪宗、南傳、乞士的寺院一起共存，修行法門也盛行持誦《法華》、《藥師》等經。

佛教教育與三壇大戒之間有密切關係，在越南，僧人一定要世俗的教育和佛教教育都具備才能受戒。受沙彌戒必須國中畢業和通過初級佛法測驗；比丘戒則必須具備高中學歷與中級佛學證書，還要通過戒壇的審核和考試，才能登壇受戒。雖然戒壇都有三壇，但是每個戒子只能承受一種戒別，依規定須隔兩年才可以受更高的戒體。所以能夠順利受完三壇大戒，至少要七、八年。

我們在當行者（淨人）之前還要經過近事者（近事男，近事女）的階段，看看能否適應寺院生活，也是考驗初發心。通過後，才能落髮當淨人，至少兩年才能受沙彌戒。以上分享，歡迎各位到越南參訪，一定會對越南佛教有更豐富的體驗。



▲ 韓國的傳統佛寺與僧人。（朱莉攝）

《佛教典範如何轉移》介紹

◎莊國彬（學術出版組組長）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呂凱文教授，目前由新文豐出版新書《佛教典範如何轉移》，書中收集了呂老師十篇論文，題目分別是：〈梵思想的佛格義〉、〈初期佛教的種姓系譜學〉、〈當佛教遇見耆那教〉、〈以兩類《薩遮尼乾子經》論兩種佛教典範理解「他者宗教」之詮釋學問題〉、〈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重讀王舍城結集〉、〈以兩類《大般涅槃經》論兩種佛教典範之判教原則的詮釋學轉向問題〉、〈以兩類《央掘魔羅經》探討聲聞乘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兩種佛教典範下的郁伽長者〉、〈以兩種《善生經》探究佛教倫理的詮釋學轉向問題〉等。

這本書的結構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可視為宗教教際交涉，也就是佛教與他者宗教之交涉。重點主要是放在後起的初期佛教，如何理解與詮釋異於自身的印度教前輩文化，藉此排除解

釋上的宗教障礙，讓自身在印度宗教舞臺順利進行宗教典範轉移。這部分是從第一章到第五章，分別就佛教與婆羅門教、耆那教與虛無主義者之交涉進行論述。

第二個層次可視為佛教內部的交涉層次，亦即探索前後期佛教典範如何交涉，主要是聲聞乘與大乘的交涉。重點主要放在後起的大乘佛教，如何理解與詮釋異於自身的佛教前輩文化，並且透過何種書寫與創作經典的策略，達到佛教典範轉移的目的。這部分是從第六章到第十章，涉及阿難、迦葉、央掘魔羅、郁伽長者與善生居士等人物。

呂凱文教授的這本書主要是以哲學、詮釋學的角度，討論佛教經典的轉移與轉變。對於佛教詮釋學有興趣的人，值得一讀。



《長阿含研究論文集》出版

◎莊國彬（學術出版組組長）



《長阿含研究論文集》是集結2013年10月18、19日在本校舉行的「漢譯長阿含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結合了阿含研究小組和漢堡大學的Numata佛學研究中心，而由蔣經國基金會的國際交流計畫所贊助。本書是義大利籍的法樂法師（Sāmaṇerī Dhammadinnā）繼《增一阿含研究論文集》後，所編輯的第二本關於漢譯阿含經的研究。

這本書收錄了六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由無著法師（Ven. Anālayo）所寫的〈沒有相對應梵語、巴利語的三部漢譯長阿含〉，無著法師的結論認為，這三部漢譯《長阿含經》應是較後期才編輯進長阿含的經典。

第二篇是由Roderick S. Bucknell所寫的〈吉爾吉特梵語寫本《長阿含經》的結構與巴利長部的比較〉，透過不同語本的比較，顯示了現存的梵語和巴利語長部都有明顯編輯的痕跡。

第三篇是遠藤敏一的〈《長部注》與長部誦法師〉，這篇文章探討誦法師（bhāṇaka）的傳統，特別是《長部注》

（Samaṅgalavilāsinī）的傳承。遠藤敏一認為，在長部誦法師內部中，還有不同組的長部誦法師。其中的證據是漢譯的《長阿含經》中包含了一些「額外」的經文，在相對應的巴利經文是沒有的，而是出現在《長部注》中。這表示了漢譯的長部誦法師和巴利的長部誦法師，在經文的背誦上是有所不同的。

第四篇文章是由Jens-Uwe Hartmann所寫的〈說一切有部的《長阿含經》：編輯的目的是什麼？〉，主要是從吉爾吉特的寫本探討編輯《長阿含經》的目的，特別是從某些段落來看，編輯的目的之一有可能是愉悅的作用。

第五篇論文是由本校洪振洲老師所寫的〈漢譯《長阿含·世記經》的文本分析〉。洪老師透過電腦的文本分析，得出《世記經》和其他的《長阿含經》的文本風格是不一致的。

最後一篇文章是由辛嶋靜志的〈說一切有部侵蝕法藏部的漢譯《十上經》〉，由比對現存的不同版本，他認為現存有些版本的漢譯《十上經》的不同，是受到說一切有部傳統的影響。

這幾篇論文代表了國際佛學界對《長阿含經》一些最新的研究。對《阿含經》研究有興趣的人，不容錯過這本學術著作。

演講・音樂・茶禪 法界與法鼓的交流

◎呂幼如（國際事務組組員）

美國柏克萊佛寺住持、法界佛教大學暨世界宗教研究院教授恒實法師、該校副校長包果勒（Douglas Powers）、發展與策略計畫主任陳頌明（Wayne Chen）及宣化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鄭果壁（Anne Cheng）等一行六人，於2014年11月28日蒞校訪問。恒實法師並以「在高科技世界中維護人性的價值」為題，於本校海會廳演講，晚間並以茶禪的形式，與本校師生展開學佛經驗的分享，交流熱絡。

恒實法師曾於1977年6月，與恒朝法師（Dr. Martin Verhoeven）開始為期兩年半的三步一拜朝聖之旅。從南加州帕沙町納（Pasadena）市的金輪聖寺出發，沿著海岸公路，一直到北加州尤卡亞（Ukiah）的萬佛聖城，全程約一千二百八十七公里，每天將禮拜的功德迴向世界和平。恒實法師在整個朝聖之旅，以及之

後繼續的兩年時間，完全止語。恒實法師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佛教音樂人，擅長演奏吉他。2008年，他發行了第一張音樂專輯*Paramita: American Buddhist Folk Songs*。演講過程中，法師搭配吉他伴奏，清揚的音樂及法師慈悲的唱誦聲音，使在場的聽眾，生起對佛陀及佛法景仰的宗教情操，會場洋溢著寧靜、平和及慈悲的氛圍。

法界大學是由宣化文教基金會所創辦，與本校更名之前的佛教學院，辦學方式、規模及課程，極為相近。除了演講交流，恒實法師一行也參訪了本校揚生館、麗英館等新校舍，對於新建校舍簡樸低調但又貼近生活的設計，展現了濃厚興趣，希望能做為該校新建校舍時的參考。未來本校與法界佛教大學將就教師及學生的交換、交流，建立進一步的合作關係。

為生命注入新力量

寧波企業家深度訪學，心靈環保課程反應熱烈

◎呂幼如（國際事務組組員）

本校與臺大EMBA及清大等校合作辦理「寧波企業家新生代臺灣深度訪學」，其中的心靈環保成長課程，於2014年11月12、13日在本校及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之禪堂舉行。學員包括寧波市人力資源相關單位主管及企業家等近三十人，由本校研修中心、國際事務組及禪堂等單位優秀師資結合法鼓山境教道風，帶領學員進入禪修「靜」與

「淨」的心體驗。

本活動規畫的初衷，希望在企業管理的專業領域之外，給予企業主心靈環保的觀念，建立提昇人品的核心價值；藉由禪修觀念及方法的學習，期使學員學習隨時安定身心的方法；在提昇個人生命品質的同時，也能對所經營的企業及員工有所助益。課程內容包括禪修基本教學、學佛行儀及心靈環保講座。時間雖然很

短，但學員們對於學習過程中所帶來的放鬆身心及寧靜，回響熱烈，希望能進一步學習禪修，為生命注入「心」力量，拓展人生的心視界。

本校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培育兼具慈悲與智慧的領導者與卓越佛教人才，服務社會、促進文化與國家發展、探索與反思人類未來願景。鑑於兩岸教育界及企業界主動提出需求，已舉辦兩次類似的心靈環保成長課程，學員反應熱烈，並期盼未來能還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本校及法鼓山體系所舉辦的各項相關課程。本校禪文化研修中心，未來亦將規畫相關系列課程，以符合社會大眾、海內外迫切的需求。



▲學員在禪堂中，體驗禪修「靜」與「淨」的心體驗。

Meeting DILA Faculty

On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Practice of the Dharma

by Sāmaṇerī Dhammadinnā

Starting from the present issue of DDBC newsletter, Sāmaṇerī Dhammadinnā interviews DILA faculty members, so as to give readers a personal feeling for what brought our academic staff to the academic and/or traditional study of Buddhism, and to the Dharma itself. She starts with Chuang Kuo-pin (莊國彬), otherwise known as “KP-Laoshi”.



▲ KP-Laoshi

Dhammadinnā: What brought you to Buddhist studies? Did you originally come to Buddhist studies via an interest in the Dharma (texts, meditation, social engagement)? If you did come to Buddhist studies from an initial interest in the Dharma, what then originally brought you to the Dharma?

KP-Laoshi: I never studied Buddhism before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For a few months after graduation, I was wandering around and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next. To put it plainly, I began to ponder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life.

On one lovely autumn afternoon, I went into Nung Chan Monastery by chance, where I met Ven. Sheng Yen for the first time. His words of wisdom attracted me. Later I went to his Sunday morning Dharma talk; the topic was the Diamond Sutra. I also joined the basic meditation class. There Ven. Sheng Yen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he needed money and people to support the institute. For these reasons, at the

age of 25, I enrolled at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ince then, the Buddhadharma is at the core of my life.

Academic Studies and Religious Practice

Dhammadinnā: When did you join DILA (then DDBC) faculty? Why did you choose to seek a position at DILA?

KP-Laoshi: I spent five years to finish the three-year course at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n I received a grant from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left for England in 1996. I received my Ph.D.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in 2003, before coming back to Dharma Drum Mountain in 2004.

Dhammadinnā: How is your academic interest and training in Buddhist studies related to your study and practice of the Dharma? Have you experienced conflicts, tensions, contradictions or simple challenges in yourself regarding this? Are you interested and able to integrate them in your personal and academic life?

KP-Laoshi: Tibetan Buddhism was my major when I was in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When in England, I shifted my studies to Abhidharma. I also changed my practice from tantra practice to Vipassana meditation. I do not feel any conflict between my study and practice, and I believe my study and practice go hand in hand. That said, I am aware of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academic studies and religious practice. It is akin to loving your best friends while knowing all your friend's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and religious practice, I have to say, it depends. Sometimes it does benefit the practice, and sometimes it does not, while sometimes it may even jeopardize the prac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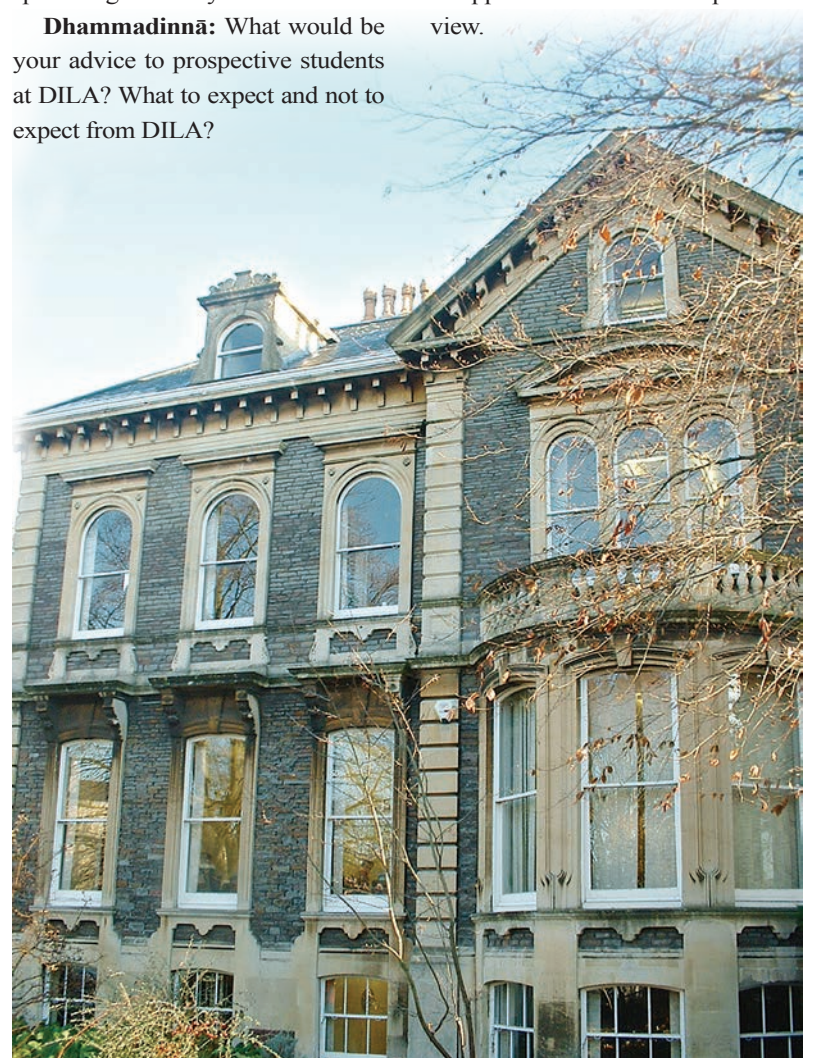
Advice and Expectation

Dhammadinnā: What are the most difficult, most inspiring and most rewarding aspects of your life (academic and beyond) at DILA?

KP-Laoshi: Life in DILA is shanty, shanty, shanty..... Very

peaceful that is! So there are no major difficulties living here. However, before life in DDBC/DILA, the most difficult time of my life was when I studied in England. I spent eight years to get my Ph.D. I struggled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anskrit and Pali, as well as English writing. However, I found that English culture became part of my life. And from time to time, I even speak English in my dreams!

Dhammadinnā: What would be your advice to prospective students at DILA? What to expect and not to expect from DILA?



▲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Bristol

Jon Kabat-Zinn's Visit to Dharma Drum Mountain

by Luke Gibso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Prof. Jon Kabat-Zinn—the world-renowned and now retired founder of the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program—has been giving lectures and workshops across East Asia, including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where I met him for the first time two years ago. This month Jon has come to visit Taiwan for two weeks of

public talks and meetings with local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terested in the use of contemplative practices to help both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cope with chronic pain and anxiety.

Yet, Jon's first stop on his tour of the island was our institute on Dharma Drum Mountain, where he spent two days recovering from his trip and interacting with teachers and members of the local Sangha.

While Jon never met Master Sheng Yen in person, he expressed his deep admiration for the Chan Master, whose teachings he had encountered many years ago by reading some of the Master's English works on Chan practice. The Chan connection runs deeper still with Jon's son attending a retreat led by Master Sheng Yen himself. Venerable Guoyuan, whom Jon met on the first day of his visit, said that he remembered meeting his son on that occasion, a “handsome young man”, as the Venerable put it. In the course of our discussions, Jon acknowledged that, of all Buddhist traditions, the teachings of Zen or Chan had been most influential in shaping his approach to bringing contemplative practices to the mainstream of Western society. Rather than teaching mere techniques aimed at relieving stress or bodily pain, Jon always envisioned his work and the practices he promotes as having the potential for a far more

radical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hift in one's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During the small workshop given on the second day of his visit, Jon recounted how, while he was visiting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 India, a religious scholar had expressed his disapproval of Jon's use of meditation techniques without explicit reference to Buddhist teachings, fearing that such concessions would eventually lead to Buddhism's demise. While His Holiness did not directly respond to the scholar's objection, the Dalai Lama made his sentiment clear by noting that the world is filled with people suffering and in need of help, yet Buddhists only represent a small fraction of those people. By presenting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in a way that does

not require any type of religious commitment or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t doctrines, Jon and his colleagues have been able to reach out and bring relief to patients who, otherwise, would never had encountered such practices.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have met with Jon again; this time around I got to discuss with him the state of Buddhism in the West as well as the risk of seeing mainstream society appropriating Buddhist practices to further its own productivist ends while missing the Dharma's invitation for a more radical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shift. Jon was deeply moved and impressed by the community and vision he witnessed here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and I don't think I am alone in hoping that Jon will come to Taiwan again in the future.

